

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研究*

——基于转型升级与国际比较的视角

许庆明 胡晨光

【摘要】文章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阶段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问题。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正面临着其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带来的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变化,从而使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放慢;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要以工业化进程为核心,不应脱离工业化进程,盲目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要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的赶超。

【关键词】城市化 工业化 转型升级 国际比较

【作者】许庆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晨光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转变。这一阶段,如何处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面对经济转型的艰巨任务,一些学者提出了“以城市化推进工业化、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观点,认为城市化水平的合理提高有利于促进区域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的高度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王小鲁,2002;苏卫东,2012)。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将提高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与城区的扩大。如沿海发达地区在“十一五”期间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基础上,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于城市化的追求又设定了新的目标,江苏、浙江和广东省分别将城市化率设定在63%、63%和68%的水平^①。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710731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YJC790058)及浙江省重点软科学基金项目(项目计划编号:2011C25051)资助。

①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然而,城市化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国内部分学者关注了中国城市化的质量问题,认为中国必须正确处理好城市化质量和数量的发展关系(陈明星等,2010;方创琳、王德利,2011)。他们的论述凸显城市化应该体现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本主义目标,而中国部分地区的城市化过程似乎偏离了经济发展的人本主义精神。纵观理论界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缺乏针对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沿海发达地区不存在加快城市化的内在动力

2011年,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7.0%、62.0%、64.0%,中国总体的城镇化率为51.27%(中国市长协会,2012)。从长期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还将继续提高,但近阶段,在中国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的地区主体方面,中、西部地区将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而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言,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将会放慢,城市化发展主要表现为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动能的优化,这是由城市化产业基础的变化所决定的。

一个区域城市化的基础是城市的非农产业,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规模与结构是决定区域城市化速度、城市化结构的基本因素。城市化率增长的幅度取决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容和结构。在今后的一个时期,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的产业基础将发生重大变动,从而导致城市化速度、结构的变动。

(一) 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使人口城市化提升的推动力减弱

改革开放30年来,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的要素集聚促使沿海发达地区非贸易资源要素成本与生活成本上升。这一方面降低了中西部农民工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及其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意愿;另一方面劳动成本上升也削弱了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并导致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吸引了中西部本地人口在当地就业,减少了中西部人口外出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就业活动。以上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大大减弱了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推动力。

(二) 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产业结构的变动将导致人口城市化结构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赶超对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低成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再支撑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求其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在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体现为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速度相对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沿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其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发展受到约束,开始向区域外转移。沿海发达地区在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将导致其制造业领域吸纳劳动就业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从而降低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地区就业的贡献;而其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发展比重相对增大这一特点,将导致其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以及对一般民工等普通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制造业领域产业结构的变化

总体上将减少单位 GDP 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从而影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在服务业领域,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并逐步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沿海发达地区服务业经济转型要求服务业比重,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增加的这一特点,将促使沿海发达地区对服务业就业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然而,沿海发达地区今后对服务业劳动就业人口的需求将主要是从事科研与开发、金融、信息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力需求虽然也会有一定比例增加,但其增幅要小于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这将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单位 GDP 对服务业就业人口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影响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三) 沿海发达地区区域内农民的非农化意愿减弱

由于中国存在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障碍和行业“壁垒”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与价值观的变化,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生存型动因减弱,而个人发展型动因增强(罗忆源,2007;杨琦、李玲玲,2011),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可能宁愿选择在家失业,也不愿到城镇的非农产业就业。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正面临着其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带来的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变化,从而使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放慢。这就要求沿海发达地区不能脱离地区工业化进程盲目追求城市化率,而是要实现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的转变。

二、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压力大于城市化的压力

下面通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当前状况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相应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来分析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当前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特征。

2009年,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以下简称“沿海三省”)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突破 4 万元,如果按当前美元价格以 1965 年为基期计算,人均 GDP 则在 1 100 美元左右;以 1987 年为基期计算,在 3 400~3 700 美元。“沿海三省”的人均 GDP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以 1965 年为基期,在 2 000 美元左右;以 1987 年为基期,在 6 000 美元左右(见表 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法国、德国 1965 年人均 GDP 大致在 2 000 多美元,韩国 1987 年人均 GDP 大致为 6 000 美元。可见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与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的法国、德国 1965 年的 2 000 美元阶段,韩国 1987 年的 3 000 美元阶段相当。

本文选取了 1965~1987 年某年为基期,人均收入突破 2 000 和 3 000 美元的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 5 个国家(以下简称“发达五国”),考察这些国家处于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类似发展阶段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方面的差异。

表 2 显示,“发达五国”2 000 美元阶段城市化率在 53.92%~67.1%,平均为 61.74%;3 000 美元阶段城市化率为 55.36%~72.86%,平均为 66.6%。而这些国家三次产业占比,在突破

表 1 用美元表示的“沿海三省”人均 GDP 水平(2009 年)

| 地区 | 人民币 (元) | 当前价格 (美元) | 以 1965 年为 基期(美元) | 以 1987 年为 基期(美元) | 购买力平价 | |
|----|------------|--------------|---------------------|---------------------|--------------|-------------|
| | | | | | 以 1965 年为年基期 | 以 1987 年为基期 |
| 江苏 | 44607.81 | 6530.20 | 1151.87 | 3771.49 | 2103.77 | 6888.30 |
| 浙江 | 43880.93 | 6423.79 | 1133.09 | 3710.03 | 2069.49 | 6776.06 |
| 广东 | 40965.51 | 5997.88 | 1057.96 | 3464.05 | 1931.99 | 6325.86 |

注:(1)当前价格美元算法为按当前汇率计算浙江及其地级市的美元人均 GDP 收入,然后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美元历史上通胀指数将当前人均收入的美元转换为基期的美元水平。世界银行缺乏 1965~1970 年通胀指数,本文采用 InflationData.com 提供的美国 1965~1970 年 GDP 的通胀指数。(2)购买力平价算法按世界银行提供的当年购买力转换因子将浙江及其地级市的人均收入转换为当前购买力平价测度的美元人均收入,再将购买力平价人均收入按美元历年通胀指数转换为基期美元收入水平。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2010)》、《浙江统计年鉴(2010)》、《广东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2 000美元时,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的平均水平高于第二产业,表明“发达五国”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已处于主导地位。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当前发展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指标如表 3 所示。通过对表 2、表 3 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本接近“发达五国”类似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目前并不存在加快城市化的压力。把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与“发达五国”2 000 和 3 000 美元阶段的城市化水平相比,可以发现,“发达五国”相应发展阶段的城市化率为 61%~66%,目前“沿海三省”基本达到“发达五国”2 000美元阶段的平均水平。因此,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并不存在城市化滞后、需要加快发展的问

题。第二,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低于“发达五国”类似发展阶段的水平,存在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比较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与“发达五国”相应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出,“沿海三省”第二产业比重大大高于“发达五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则相应地低于“发达五国”。从平均水平

表 2 “发达五国”2000 和 3000 美元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指标

| 国家或地区 | 突破 年份 | 城市化 率(%) | 第二产业占 GDP 的百分比 | 第三产业占 GDP 的百分比 |
|-----------|----------|-------------|-------------------|-------------------|
| 2000 美元阶段 | | | | |
| 法国 | 1965 | 67.10 | — | — |
| 德国 | — | — | — | — |
| 意大利 | 1970 | 64.30 | 39.29 | 57.18 |
| 日本 | 1971 | 53.92 | 45.51 | 49.83 |
| 韩国 | 1983 | 61.62 | 38.50 | 46.92 |
| 五国平均 | | 61.74 | 41.10 | 51.31 |
| 3000 美元阶段 | | | | |
| 法国 | 1971 | 71.46 | 34.55 | 57.86 |
| 德国 | 1971 | 72.86 | 46.73 | 49.83 |
| 意大利 | 1973 | 65.08 | 38.64 | 53.28 |
| 日本 | 1973 | 55.36 | 45.70 | 48.15 |
| 韩国 | 1987 | 68.46 | 41.48 | 47.76 |
| 五国平均 | | 66.64 | 41.42 | 51.38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11 年)。

表3 “沿海三省”城市化与工业化指标

| 地区 | 城市化率(%) | 第二产业占GDP的百分比 | 第三产业占GDP的百分比 |
|------|---------|--------------|--------------|
| 江苏 | 55.60 | 53.90 | 39.60 |
| 浙江 | 57.90 | 51.80 | 43.10 |
| 广东 | 63.40 | 49.20 | 45.70 |
| 三省平均 | 59.00 | 51.60 | 42.80 |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2010)》、《浙江统计年鉴(2010)》、《广东统计年鉴(2010)》、《江苏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广东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中、西部之间的区域流动在较长时期支撑了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缓解并推迟了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及服务业发展为主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因此,“沿海三省”第二产业比重高,在一定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深,其产业结构转换的滞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会日益显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十分迫切。

总之,随着东、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的推动力减弱,第二、三产业之间结构转换的压力加大,产业升级的压力大于人口城市化的压力。

三、过度城市化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2011)》高、中、低收入国家划分标准,中国2010年基本进入上中等收入(3 945~12 916美元)国家行列,而江苏、广东、浙江三省早在2006年就开始先后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行列。

一些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两者关系方面存在不少经验教训。如果“城市化进程”能够以“工业化进程”为核心,合理推进,那么该国或区域经济就由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但如果城市化超越工业化进程而片面推进,就会不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据郑秉文(2011)的研究,日本、韩国、意大利各自用了12年、7年和10年由上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乌拉圭等国(以下简称“拉美五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至今最少的也有16年,均未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拉美国家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杜传忠、刘英基,2011)。

“拉美五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杰等,2012),而“过度”城市化是其原因之一。表4显示了“拉美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状况。

表4和表5表明,“拉美五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的

看,在2 000美元时,“发达五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为41.10%,第三产业比重为51.31%。而目前“沿海三省”第二产业比重为51.60%,第三产业比重为42.80%。可见“沿海三省”的产业结构层次大大低于“发达五国”的相应发展阶段。

沿海发达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偏高的产业结构是中国东、中、西部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中国与“发达五国”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丰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东、

城市化平均水平，比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2009年城市化的平均水平还高，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过度的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的非农产业发展难以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必要的

基础设施。大量涌入城市的破产农民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民选政府为了选票必须不断向市民提供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庞大的政府福利开支制约了经济发展；同时，“超前”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杜传忠、刘英基，2011）。

通过比较表4、表5的数据可以发现，2009年“发达五国”人均收入是“拉美五国”平均水平的近4倍，而城市化水平却要比“拉美五国”低14个百分点左右。在“发达五国”内部，2009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比韩国约低15个百分点，但人均收入却比韩国高1倍以上。不论是“发达五国”的成功经验，还是“拉美五国”的教训都说明，城市化率变化速度的快慢与经济发展绩效并不存在正比关系。合理的城市化进程能促进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等同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产业结构发展的层次，城市化水平不是决定因素。

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区域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当前阶段就要防止出现城市化水平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状况。从表5可以看出，2009年“沿海三省”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平均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18.17%，而城市化水平却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80.20%。显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当前阶段需要防止过度城市化。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要实现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宜盲目追求过高的城市化率，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其城市化进程要以工业化、现代化需要为核心稳妥推进。

四、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道路的合理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产业发展的状况，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决

表4 “拉美五国”相关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指标

| 国家 | 2009年人均GDP (美元,当前价格) | 2009年城市化率(%) |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时的城市化率(%) |
|------|-------------------------|--------------|--------------------|
| 阿根廷 | 7665.55 | 92.20 | 86.20(1988年) |
| 巴西 | 8114.12 | 86.04 | 77.80(1995年) |
| 智利 | 9644.50 | 88.72 | 84.18(1994年) |
| 墨西哥 | 8143.83 | 77.50 | 72.20(1992年) |
| 乌拉圭 | 10790.29 | 92.40 | 89.60(1992年) |
| 五国均值 | 8871.66 | 87.37 | 82.00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11年)。

表5 “沿海三省”与“发达五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比较

| 国家或地区 | 人均GDP (美元,当前价格) | 城市化率(%) |
|---------|--------------------|---------|
| 法国 | 41050.89 | 77.58 |
| 德国 | 40873.27 | 73.72 |
| 意大利 | 35083.65 | 68.24 |
| 日本 | 39726.61 | 66.64 |
| 韩国 | 17078.21 | 81.68 |
| 五国平均 | 34762.53 | 73.57 |
| 三省平均 | 6317.29 | 59.00 |
| 三省与五国之比 | 18.17 | 80.20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11年)。

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不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因此,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必须尊重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城市化必须以工业化进程为核心,紧紧围绕区域产业结构的当前特征与未来发展的方向,合理推进。那么,沿海发达地区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当前特征与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何?这就需要研究东部沿海地区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的差异,将发达国家当前阶段的产业结构状况作为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可供借鉴的方向。表6显示,“沿海三省”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占GDP之比分别是“发达五国”平均水平的179%、62%、70%。这表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主要在于其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滞后。沿海发达地区要实现发达国家的赶超,就需要改变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地区定位上,变目前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为“世界服务业中心”;变“制造品输出中心”为“服务输出中心”。表6还表明,日本之所以可以凭借相对不高的城市化率取得比韩国等国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在于其拥有相对发达的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其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分别为71.50%、48.66%,高于韩国的56.53%、35.80%。

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由于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也有利于提升工业制造品的层次和附加值,提高经济发展的层次与水平,从而实现区域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此外,沿海发达地区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可以为制造业提供市场。

表6 “沿海三省”与“发达五国”产业结构的比较

| 国家或地区 | 第二产业占 GDP的百分比 | 第三产业占 GDP的百分比 | 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的百分比 |
|---------|------------------|------------------|--------------------|
| 法国 | 21.80 | 75.49 | 47.94 |
| 德国 | 29.07 | 69.79 | 45.20 |
| 意大利 | 27.07 | 70.34 | 47.08 |
| 日本 | 27.17 | 71.50 | 48.66 |
| 韩国 | 39.23 | 56.53 | 35.80 |
| 五国平均 | 28.87 | 68.73 | 44.94 |
| 江苏 | 53.90 | 39.60 | 29.07 |
| 浙江 | 51.80 | 43.10 | 31.70 |
| 广东 | 49.20 | 45.70 | 33.64 |
| 三省平均 | 51.63 | 42.80 | 31.47 |
| 三省与五国之比 | 179 | 62 | 70 |

注:(1)表中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10)》、《浙江统计年鉴(2010)》、《广东统计年鉴(2010)》及格罗宁根(荷兰)增长和发展中心;(2)发达国家为2002年数据,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为2009年数据;(3)由于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统计年鉴中批发和零售业没有分开统计,在统计比较时,零售业也被纳入生产性服务业计算。

提升沿海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水平,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总量,这要求沿海地区要大力扩展服务的区域范围,不但要服务本地制造业,而且要努力服务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甚至世界范围的制造业;二是提升其服务业质量,这主要依靠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实现,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实现结构优化与质量的提升。沿海发达城市通过服务业的总量扩展与结构优化,增强城市辐射、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增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表 7 通过比较东部“沿海三省”与“发达五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揭示“沿海三省”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方向。从表 7 可以看出,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的科学研究、地质勘查和商务服务业及房地产与“发达五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科学研究和商务服务发展不够,意味着三省在科学研究及开发、市场营销、品牌建设及其管理方面投入太少,严重影响了其制造业产品的升级和附加值的提升。沿海发达地区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够,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健全。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存在的过度投机导致房价畸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消费还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需求。“沿海三省”金融业除江苏金融业大幅低于“发达五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两省都高于“发达五国”平均水平。其中,浙江大幅高于“发达五国”平均水平。这表明沿海发达省份个别地区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过于繁荣,流动资本需要合理引导和适度抑制。“沿海三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批发和零售业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内部的发展结构相比基本正常;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除广东外,江苏、浙江均明显落后“发达五国”的服务业内结构水平。另外,必须看到沿海发达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为其提供的市场需求,因而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由“制造品输出中心”向“服务输出中心”转型的过程,必然要经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高附加值制造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进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经济中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比重将不断下降,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会持续上升,这必将引起城市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使城市化的动力结构由原来的制造业推

表 7 2009 年“沿海三省”与“发达五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

%

| 国家或地区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批发和零售业 | 金融业 | 房地产业 | 科学研究、地质勘查和商务服务业 |
|-------------|-------------|----------------|--------|--------|-------|-----------------|
| 法国 | 8.84 | 9.85 | 22.49 | 9.94 | 26.08 | 22.8 |
| 德国 | 7.93 | 8.12 | 24.23 | 9.63 | 26.46 | 23.62 |
| 意大利 | 10.72 | 8.63 | 27.26 | 12.38 | 20.48 | 20.54 |
| 日本 | 9.01 | 5.2 | 29.52 | 14.48 | 27.75 | 14.03 |
| 韩国 | 13.02 | 8.94 | 24.59 | 22.83 | 22.07 | 8.54 |
| “发达五国”平均 | 9.90 | 8.15 | 25.62 | 13.85 | 24.57 | 17.91 |
| 江苏 | 7.97 | 2.94 | 18.67 | 4.92 | 7.98 | 3.49 |
| 浙江 | 12.18 | 7.07 | 29.08 | 26.06 | 18.07 | 7.55 |
| 广东 | 12.01 | 9.72 | 29.42 | 17.19 | 18.60 | 13.05 |
| 与“发达五国”均值之比 | | | | | | |
| 江苏 | 80 | 36 | 73 | 36 | 32 | 19 |
| 浙江 | 123 | 86.70 | 113.50 | 188.20 | 73.50 | 42.20 |
| 广东 | 121 | 119 | 115 | 124 | 76 | 73 |

注:同表 6。

动为主,转变为服务业推动为主;城市化发展阶段也将由原来的速度增长为主,进入结构优化为主的阶段。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沿海三省”工业化进程的当前特征,并与部分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进行比较,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规模与结构是决定区域城市化状态的基本因素,因此虽然从较长时期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还将继续提高,但目前,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存在加快城市化率的产业基础。(2)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取决于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层次,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过度城市化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3)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将逐步由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区域城市化进程需要紧密围绕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当前特征与未来发展的方向,合理推进;城市化发展也将由速度增长为主的阶段,进入结构优化为主的阶段。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针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与区域经济转型进程提出以下建议:(1)当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应该突出区域经济由“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世界服务业中心”转型这一主线,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以服务业规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促进区域制造业和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2)淡化以城市化水平提高为目的的区域规划发展战略,城市化过程必须紧紧围绕区域的工业化进程,以提高区域的经济竞争力为目标。政府不论是加快还是放缓城市化进程都需要服务和服从区域经济工业化发展大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应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独立指标。

参考文献:

1. 陈明星等(2010):《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地理学报》,第12期。
2. 杜传忠、刘英基(2011):《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警示》,《理论学习》,第6期。
3. 罗忆源(2007):《失业民工眼中的“民工荒”——自愿性失业青年农民工的个案研究》,《调研世界》,第7期。
4. 方创琳、王德利(2011):《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地理研究》,第11期。
5. 苏卫东(2012):《城市化、工业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第7期。
6. 王小鲁(2002):《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7. 杨琦、李玲玲(2011):《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8. 郑秉文(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9. 高杰等(2012):《“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第3期。
10. 中国市长协会(201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中国城市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犁)